

中国的社会改革与 社会学的发展研讨会综述

编者按：“中国的社会改革与社会学的发展”研讨会是由这篇综述所列八单位联合召开的。这次讨论会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本综述，也仅代表一家的综述，未经与会者和领导小组共同讨论通过，本刊发表时仅略作删改。综述所列代表们的发言意见，均属个人或部分人之见，不同意见也未能详述。我们将这些信息发表在这里，仅供读者参考。与会各单位代表众多，对会上发言“见仁见智”，各有所见，定然各有各的述评。我们翘盼中国社会学的园地上，百花齐放，春色满园。因此，就是综述之类，我们认为也是多种“版本”，不要统一为好，不知与会各单位、代表和读者诸君意下如何？

1987年11月25日至29日，在贵阳市召开了“中国的社会改革与社会学的发展”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社会学研究》杂志社、《光明日报》理论部和共青团贵州省委、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贵州省民族学院等八个单位联合发起和主办，参加的代表有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90余名。

这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在“十三大”精神的指导下，着重讨论中国的社会改革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问题。在深入讨论中心议题的过程中，代表们还就与之有关的若干问题（如中国的现代化、社会学的中国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展开了讨论。兹将代表们对这些问题的主要见解概述如下：

一、关于中国的社会改革与社会发展问题

代表们一致认为，怎样进行全面改革并实现整体发展，这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伟大历史任务，也是社会学工作者应当系统地、深入地开展研究和讨论的重要课题。

一些代表指出，改革和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主题。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困和落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当然，我们也不能走极端，把生产力的发展或经济的增长等同于社会的整体发展。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子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多指标的概念，是一个多元的过程。在社会的整体发展中，“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固然具有决定作用，是社会其他子系统发展的基础，但它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和唯一因素。事实上，社会的健康运行不能只靠经济的单一子系统做保证，而需要依靠各子系统的互相支持和配合。比如，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不能不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问题，不能不变革人们的陈旧观念和改变人们的传统心态与生活方式。这说明，为确保社会的整体发展得以顺利进行，就须合理地、适时地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以建立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社会系统。基于上述认识，这些代表提议，应当建立以生产力发展为基

础，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相互协调发展的战略。

另一些代表认为，我国正处于历史性的巨变之中。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加快和深化改革，不过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在“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在他们看来，以上手段和目的结合，从社会学的整体系统观点考虑，便构成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化，亦即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结构向商品经济的工业社会结构的转化。如何实现这一转化呢？代表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了分析：他们认为，孔德、帕森斯等西方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注意了结构的形式、相对静止和功能作用，却忽视了结构的内容、绝对运动和因果关系，因而不能全面地、科学地说明社会结构的演变规律。代表们提出，社会结构可以归结为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为了交换和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而形成社会整体系统联结的关系模式。这样，把结构形式归结为社会关系的组合模式，而把需求理解为发生各种社会关系的动因，就可以根据需求的变化去认识社会结构的变化规律，从而为人们自觉地调整社会结构提供理论指导。循着这一思路，他们认为，我国社会目前的基本需求是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为满足这一基本需求，实现整体性的社会结构的转变，关键在于找到一种适宜于促进这种转变的结构模式与转化途径。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在总结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分析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基础上，他们指出，我国决不能再走西方城市化的老路，因为八亿农民涌向大城市，大城市肯定承受不了；在农村就地实现城市化、工业化与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惰性太强，阻力太大，且自然条件也不允许。所以，只有找出一条新的路子，那就是：采取中间突破带动两头的办法——直接有计划地建设和发展中等城市（20~50万人），吸引广大农村和大城市的人力与物力向它集中和转移，以便形成全国大中小城市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网络结构。不可否认，这一以发展中等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网络结构的战略，还只是初步探索性的见解，鉴于它所依据的理论研究和调查资料之有限性，有的代表对实现这一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持保留意见。

还有些代表提出了“良性社会结构”的概念。他们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对社会的活动、组织、管理以及内部作用关系的重新规范，说到底，是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再建和再造。一言以蔽之，改革是社会结构的良性化过程，或者说，良性社会结构是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在持此种观点的代表看来，所谓良性社会结构，必然是自身秩序的相对稳定性与不断发展的可能性的统一。为了保证社会在稳定中求发展，必须通过全面改革，建立具备充分的开放性、通畅的流动性、蓬勃的竞争性、高水平的协同性和适度的社会制约性等特性的良性社会结构。

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许多代表感到，要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探明中国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批判和扬弃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体系。

有的代表评述了产生于美国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他们在回顾了该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思想之后指出，它虽然存在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分，却也具有下列几方面的缺陷：

（1）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分法，严重偏离了社会史实，既犯了把千差万别的人类历史和多种多样的人类社会简单化的错误，又形而上学地割裂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2）西方现代化理论强调“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和“西方化”

模式，认为西方文明是唯一先进的文明，试图把与西方文化并存的各种不同的非西方文化强行纳入西方文化体系，在理论上违背了文化多元性原理，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3）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是一致的，这实际上忽视了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抹煞了各国现代化过程的特殊规律。（4）西方现代化理论把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未能现代化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其内部的“传统性”，也是失之偏颇的，因为这种归因排除了外在因素的作用。上述缺陷表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并非是一套普遍适用的一般理论，它不可能满足一切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实践需要，更不能充当我国现代化实践的真正指南。正由于这样，有的代表提出，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规律，创立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学派。为此，不仅需要以马列主义作指导，总结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一般规律，而且还必须在理论上作如下突破：一是突破西方关于现代化的分学科理论，建立现代化的综合理论，从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研究现代化；二是突破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结构或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理论结构，确立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同时又兼顾其他社会进步的关于“现代发展”的科学概念；三是突破现代化的单一发展模式，树立现代化的多线发展思想；四是突破以“西化”或“苏化”作为现代化标准的模式，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大家认识到，现代化本身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为了真正建立具有现实意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应当加强社会学研究人员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有关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合作，进行协作攻关。

根据我国的现代化实践，有的代表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物质基础的现代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现代化”；第二层次是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它是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即经济、政治、科技、文教等体制方面的改革；第三层次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主要指国民精神、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完善与优化。他们进而认为，现代化不单是产业化或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到人们的价值观念指导的广泛的社会变动过程。其中，人的现代化，尤其是国民观念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根本和先导。这种观点的理由在于：无论是物质生活基础的现代化，还是社会运行机制现代化，都离不开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如果没有具备现代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人，就不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另一些代表却指出，认为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国民观念）的现代化，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首先，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所以，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总体上应是：物质生活基础的现代化决定、并且先于人及其观念的现代化。其次，从个体社会化的研究可知，人的行为和价值观念等心理形态的东西，都不过是一定社会文化和社会存在的反映、内化，亦即是说，人的观念的变化必须以社会文化和社会存在的变化为前提条件。这两方面说明，人（国民）的现代化先行是行不通的。那么，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何在？对人的现代化先行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代表认为，关键在于社会（主要是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其根据主要是：第一，通过对传统社会和文化的反思或与外部先进意识的接触，在一个非现代化的社会中，一部分社会成员可能实现超越于社会总体意识的观念变迁。若这些人处于最高领导集团且愿意全力推进现代化，若他们善于利用最高权力这一控制机制逐渐地改变社会结构（特别是权力结构、政治体制），使社会结构最终在脱离了权力层次的强控后能够凭其自身的活力不断地按照现代化的模式运行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就能顺利完成。第二，英国和日

本分别代表内发型和外促型现代化国家，虽然它们的现代化起始点不同，但无一不是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才实现现代化的；清代中国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中产生的一批具有先进意识的革新派人物曾力图变法维新，其中有些人还握有一定权力，但因最高权力尚握于保守派手中，最终还是失败了。成功与失败的史实从两个侧面证明：不改变社会结构并使之现代化，不但国民的现代化是一句空话，就是那些精英分子身上的“现代性”也往往被非现代化的社会压抑、禁锢。

还有些代表根据已有的研究材料指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诸如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闭关自守”和“全盘西化”的极端化思想，社会心理的失调现象，在阶级之间、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利益差别的日益增大，等等。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应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三、关于社会学的中国化和发展前景问题

代表们普遍肯定，为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必须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围绕这一点，代表们就社会学中国化的含义、前提、途径及发展前景等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含义，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是社会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中国化的统一，这要经历一个不断演进的发展过程才可达到。所谓研究对象的中国化是指，中国社会学所研究的必须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社会现象、社会过程和社会发展规律。另一方面，由于外国学者通常是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以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建构理论体系，即使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取舍地兼容其他社会文化资料，也只是把它们当作阐发其理论的佐证而不是基石。因此，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者，对任何国外社会学方法，首先必须具有一种批判的审视，对其进行认真的检讨、批判和反思，以防止盲目的全盘接收，在此基础上，把经过扬弃的外国社会学方法和中国文化特有的价值取向、认知情趣和思维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去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泛吸取其他国家社会学精华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学中国化，主要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努力。具体地说，第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研究和借鉴国外同类学科有益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建立较成熟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并从中派生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分支理论和个别理论；第二，必须在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各个方面，体现中国的文化特征和民族风格，使之易于为中国人民接受和运用；第三，必须能适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改革和开放的需要，从宏观上参予社会的管理与规划，协调社会关系，从微观上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第四，必须有适合我国国情和学科特点的调查方法，用较为科学的社会指标系统解释和说明社会生活现象，解决社会问题。

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和途径：有些代表认为，西方文化的输入，是“中国化”这个问题的根本前提。他们指出，自中国近代史上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大门被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西方文化伴随而入以来，就在科学文化和思想领域产生了“中国化”的问题。可以说，没有西方文化的输入，或者，如果我们不接受西方文化，就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至于社会学，情况尤其如此。作为本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众多“新学”之一，社会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也就是它自身逐渐“中国化”的过程。这些代表指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必然性过程主要导源于西方社会学具有科学和文化这样的两重性：作为以其方法见长的一门科学，它应该

是没有国界的（其实也不尽然，方法的选择和推广要受生产力水平、国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制约，故不能机械照搬），作为一种文化，却是有国界的，因为它具有明显的国家和民族的差异性。如果说，正是这样的两重性决定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那么，为了使社会学真正中国化，就应当注意克服“非学科化”和“西方化”这两种倾向。与此种观点相应，他们认为，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应先“化入”后“化出”，亦即：为了化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学，必须先进入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内部；二者之间存在批判、继承与被批判、被继承的关系。另一些代表则表示，与其说社会学中国化，毋宁说社会学在中国的创建或重构。在他们看来，假如强调社会学的传入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就可能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似乎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以前，中国不曾有人思考和研究过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事实上，在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之前，中国和外国许多思想家们都形成了丰富的社会学思想，那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创建或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无疑是有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的。据此，他们认为，社会学在当前的真正问题不是所谓的中国化问题，而是如何创新的问题。为了完成创新的任务，起码要经过以下途径：（1）吸收、引进。也就是批判地吸收国内外思想家在 sociology 产生前形成的有价值的社会学思想，有鉴别地引进外国社会学中符合我国理论建设和实践需要的学说、方法和技术，其中包括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西方欧美和日本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及其他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这三方面的精华。（2）验证、补充。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收集中国社会的资料，观察中国社会的现象，探索中国社会的规律，同时对外国社会学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加以验证、修订、补充和完善，使之符合中国社会实际。（3）超越、创新。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使之在中国现代进程中发挥有益的作用，即成为我国优秀文化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又成为世界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谈论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时，有的代表说，在19世纪中后期、本世纪2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学曾先后达到过三次发展高峰。如今，研究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之迫切需要，将推动社会学向第四个高峰发展。还有代表指出，世界社会学自诞生时起到现在的一百多年中，经历了从原始综合到经验实证的发展阶段；在新的条件下，它势必走向辩证综合的新阶段。所谓辩证综合，旨在重视社会学研究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也就是要以辩证的观点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力求宏观和微观、定量和定性、理论和经验、思辨和实证等等的有机结合。持这种观点的代表认为，从原始综合到经验实证再到辩证综合，这是社会学自身的发展趋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客观过程。他们进而主张，社会学应当立足中国现实，走向学科的辩证综合，以适应中国社会改革的需要。在现阶段，社会学工作者尤其要重视三方面的研究，即从改革的社会效应反观改革，从改革的综合配套反思改革，从改革的深入推进预测改革。总之，只有立足现实，面向改革，中国的社会学才有希望真正走向社会，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四、关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代表们一致认为，在社会学的自身建设中，必须重视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完善，处理好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宏观理论的关系，特别是要解决好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关系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发展到今天，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经验研究材料，因此应当把理论研究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另一种观点主张，在中国，要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学理

论, 必须从经验研究着手, 重视经验材料的积累工作。还有一些代表则指出, 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实际上是同一研究过程的两个方面, 要指望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 必须把这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因为, 若没有一定的理论作指导, 经验研究就难免盲目性、流于现象的描述或简单解释; 若不以一定的经验研究作基础, 理论研究就难免陷入概念的空谈和机械照搬, 当然也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据此, 有的代表甚至认为, 在一定意义上说, 社会学的出路就在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密切结合。具体地说, 须做到三个结合: 其一, 理论研究者 and 经验研究者应在同一研究课题或研究过程中结合起来。这样可以使他们互相配合, 扬长避短, 变过去的“单脚行走”为“双脚行走”。其二, 要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克服理论研究重定性轻定量的倾向, 也可以克服经验研究重定量轻定性的倾向, 从而提高研究工作的全面性、灵活性和应变力。其三, 要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因为宏观的课题往往由若干微观的课题组成, 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几个层次展开, 所以, 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 既能促进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 又可促使这两方面的研究互补、深化。代表们普遍感到, 鉴于我国的理论现状和实践需要, 在做到上述结合的前提下, 社会学研究工作从数量上应更多地侧重于有一定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

此外, 代表们还讨论了社会学中通常使用的其他一些具体方法、工具和技术, 诸如统计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计算机、模糊数学、社会调查、社会测量指标, 等等。大家认为, 这些方法、工具和技术虽然各有其特点和局限, 但在社会学的研究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应在研究过程中根据时间、地点、对象和条件综合地加以使用。

五、其他问题

除了以上论题外, 在研讨会期间, 代表们通过大会发言、挂牌沙龙、宣读论文等形式, 还就其他一些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限于篇幅, 在此暂不详述各种观点, 只列出所讨论的问题要目如下:

1. 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体系问题。
2. 怎样开展民族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工作。
3. 我国社会现阶段的阶级、阶层问题。
4. 我国人口发展与老龄化的趋势及对策。
5. 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问题。
6. 文化传统与农村工业化的关系问题。
7. 改革时期的社会心理状况。
8. 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条件、意义和特点。
9. 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克服途径。
10. 社会整体发展中的军队现代化建设。

(黎宗剑执笔)

执笔者工作单位: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严立贤